

余庸敬題

# 感恩這一課

(增編版)

潘宗光著

## 感恩這一課

人生在世，受到別人的恩惠很多。如果不是父母的養育大恩，我們怎能生到這個世界上來，而且成長成人？第一是要感謝父母的大恩。

其次是感謝師長教育的大恩。我們有許多人沒有機會受到正規教育，但我們從小自親友身上、社會的朋友們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我們從一無所知的孩童，成長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所有的技能，都是別人教的，也是我們從別人身上學的。這些人的教誨，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我們都要感激，感謝他們的好意美德。

我們如果能有機會受到大學教育，大學中有必修課，也有選修課。「感恩」這一課，大學中沒有列為必修或選修課，但在我們心底，卻必定列為必修課，這不但是大學的必修課，而且是人生的必修課。金庸自己，曾深深受到香港理工大學的教誨。

金庸並沒有進理工大學念書，但潘宗光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理工大學當了十八年校長。理工大學授給我「榮譽法學博士」的榮譽。我曾研究法律學，但没有博士榮譽。理工大學授給我這銜頭，督使我更加用功的研究法學，不可辜負了這銜頭。理工大學以「理以致用」的理想教育學生，我也受到這四個字的感召，覺得學問得來是要用之於社會，不可自覺有了學問，就孤芳自賞，凡是遇到社會有重大的法學爭議，必須參與，以自己所知，努力使得社會人士得到公道，使整個社會依公義而行。

潘宗光先生後來專心潛學佛學，我也對此大感興趣。我們互相勉勵，互相勸告修學。佛學博大精深，初學者不易入門，我們結合香港的同道，在這困難的道路上共同前進。空道、中道是十分困難的哲學思想，但我們有了眾多的同志，就能得到進步。佛指點我們的大道，這是必須感恩的原頭。同時我們有許多同道，大家共同前進，這也是必須感恩的一端。

金庸



·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在金庸（右）家中留影。



· 八十年代後期，太太與我和查良鏞博士在我的辦公室合照，非常感謝他為本書提字及賜序。

## 永不止息的傳承



轉眼間，退休已差不多五年了。說是退休，或許更應該說是自香港理工大學校長的職務上退下來。

教育佔了我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分別在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學院和香港理工大學，合共工作四十年。自教育崗位退下，的確是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退休時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將心意記錄在其中。

多年來，收到不少好朋友和讀者的迴響，讓我覺得將自己從可算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到成為科學家、大學校長的奮鬥歷程公諸同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我亦很高興可以在回憶錄裏，感恩和紀念曾經幫助我的人。

「感恩」，始終在我生命裏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終究是個退而不休的人，離開了大學校長的崗位後，我積極投入個人修行、佛教推廣，以及慈善基金的工作，在這幾方面經歷了不少改變和突破，亦獲不少好朋友給予寶貴的意見。因此，我認為值得將回憶錄修訂，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狀況。

這四年間，除了我有新的發展，香港理工大學同樣不斷向前邁進。看到當年跟夥伴們一同努力發展的理想逐步實現，我感到非常欣慰，亦衷心替理大師生們高興。我

相信理大一定能更上一層樓，為香港、為國家、為世界培訓專業的人才，服務社群。

我亦希望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能接觸和了解佛教的理念。我信佛已經二十年，親身感受到佛教理論的博大精深，尤其在培養良好的品德、修為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相信佛教能協助培養感恩、包容的心，當愈來愈多人擁有這樣的心態，社會便能更和諧。

感恩，不應只是一個心念，更要落實在人生的過程中，付諸行動。我感恩一路走來，很多人給予我幫助，我希望透過由我和太太成立的「精進基金」回饋社會、回饋國家，也將感恩的心傳承下去。我常說希望基金能早一天停止運作，因這代表國家已富裕起來，不再需要資助，但我希望無論國家與香港有多繁榮強盛，感恩的傳承仍然永不止息。

如果你曾看過二〇〇八年底出版的《感恩這一課——一位大學校長的回憶》，又對我近幾年的生活變化感到興趣，不妨再讀讀這書，看有沒有給你新的體會。

如果你從未看過《感恩這一課——一位大學校長的回憶》，我會推薦你看這書。

如果你對佛學感興趣，我會大力推薦你看這書，因為你會看到很多佛教的義理，體驗在我的人生中；而我作為一位科學家及佛教徒，我也談及佛教的科學觀。

無論何故，若你有機會翻開此書，希望我的經歷能給你帶來一點點啟發，這就是我出版《感恩這一課》最大的欣慰。

王康  
2013年





推薦序

感恩這一課

二

自序

永不止息的傳承

四

第一章——成長篇

一、最重要是感恩課

一〇

二、管理時間等於管理自己

一八

三、位卑未敢忘憂國

二四

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三一

第二章——從政篇

一、從政有助拓寬視野

四二

二、不能只看表面現象

四六

三、沒有政治烏托邦

四九

四、從「社會大學」畢業了

五三

第三章——教育篇

一、破格請企業家當副校長

六二

二、改革如穿越隧道

六六

三、為理大打響名堂

七二

四、儘早溝通可化解事端

八五

五、尋回傳統中華文化美德

九〇

六、大學不是象牙塔

九三

七、內地香港互助雙贏

九八

八、籌款是一門藝術

一〇八

九、人際網絡打通成功之道

一一九

十、從別人身上檢視自我

一二三

十一、退休與放下

一二九

第四章——修行篇

一、佛教與科學異曲同工

一三八

二、以出世心行入世事

一五四

三、向內心修行了解自己

一六一

四、不執兩邊取中道

一六七

五、《道德經》的智慧

一七三

六、淨土法門，我的選擇

一八二

第五章——傳承篇

一、頻頻踏足祖國土地

一九〇

二、傳統節日的文化承傳意義

一九七

三、精進基金的選擇

二〇三

四、慈悲助人愛心傳承

二〇八

五、但願人人找到心靈樂土

二二五

第一章

成長篇

## 一、最重要是感恩課

恩賜，成就大半生的我！

我回顧人生，發現一個佔據了重要分量的詞是：感恩。

我將自己在人生中涉及的領域大致劃分為四：教育、政治、佛教修行、慈善事業，四個領域都是由於一些因緣際會的情形而串成。在困難時期，總是出現一些對於我有助緣的人或事，引領了我的發展方向，這一切都令我充滿感恩，我的人生因此而充滿了正面積極的情感。

中國有一句俗語：「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也就是說懂得感恩並不足夠，應當將之實踐於生活。當然感恩不是簡單地圖報，它也是一種責任和人生境界的追求。

八年前，我開始做一些幫助內地貧困學生求學的事情，這大概是我由感恩的心所牽引着的人生旅程必然要走到的一步吧！

**戰亂，我讀不起書！**

追溯我的孩童時代，如果不是一些人的接濟相助，我根本就讀不起書。

我於一九四〇年出生於香港，家境窮困，猶記得，香港當時正經歷日治時期戰亂的洗禮，一片蕭條。據統計，一九四五年的香港人口，由一九四一年的一百六十一萬人跌至六十萬人，究其因由，除戰爭死亡外，也因很多人到內地或外埠謀生，我父親

便是其中一位，他遠去菲律賓打工，僅寄回微薄的人息，後來連這一份家用也中斷了。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母親帶着我們還要做工，十分艱辛。

當時香港大多數家庭都是如此境況，許多同輩兄弟，小小年紀便出去當學徒，學點技能以糊口，青少年輟學比比皆是。

升初中的時候，日子就要無以為繼，母親曾對我這個小兒子何去何從左右為難，她去廟裏卜卦，卦上大致說，我是「狀元命」，一定要讀書才有大好前途，信佛的母親將卦紙揣回家來，高高興興地對我說，再也不打算讓我出去做工了，無論如何省吃儉用，都要供我把書讀下去。親戚們行動起來了，七舅父替我交學費，我有個姑姑，她有七個孩子，母親將我放到她家寄養，就這樣我的溫飽得到了保證。

在姑姑家我和七位表姊妹一起，度過了九年的少年時光，即使不在母親身邊，我的生活亦不失溫暖。當時祖母也住在姑姑家，因姑姑與姑丈要忙於打理公司生意，主要由祖母幫忙看護孩子，祖母擔心我寄人籬下產生自卑，對我特別憐愛關懷。

## 人生 這一課——體會「四重恩」

我感恩上蒼給了我一個基本上是順利且豐富多彩的人生。

佛法中有說「報四重恩」——一是佛陀授正法之恩，二是父母生養之恩，三是師長教導之恩，四是眾生曠劫滋潤之恩；一個能夠體會這四重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感恩也是一種智慧，它可以令你保持健康的心態及進取的信念，對人類以至整個世界充滿熱愛。



· 媽媽與我在廣州留影。



· 童年的我。



親人們不會說甚麼大道理，卻以他們的行為潛移默化地薰陶着我，令小小的我懂得這人世間的善和愛，懂得人不能沒有根，不可以忘本，懂得要存感恩之心。當然，寄居生活也養成了我不爭、包容、能讓且讓的性格，令我將來在社會上做事情較易與人相處。

### 學費，我繳不起！

我對養我育我的親人特別感恩。我也要提及兩位老師長輩，如果不是他們，我也不可能成就學業。他們就是我就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初二年級班主任岑淑莊老師及羅怡基校長。

那時候，香港奉行精英制，沒有免費教育，學校要向學生徵取學費及堂費，學費是學校按規定向政府繳納的收益，堂費計入學校賬目，學費比堂費高出許多。我讀聖保羅小學時，考試經常「包尾」，升入聖保羅男女中學，仍然得過且過，大抵是家庭負擔沉重，總是覺得眼前一片灰濛濛的，甚麼希望也看不到。

班主任岑淑莊老師一向很關心學生，了解學生的困難，並盡力作出幫助。有一天，岑老師叫我進她的辦公室，問起我的家庭情況。

她和藹地說：「你要好好學習，我可以向學校申請替你減免一半學費。」

我回去後勁頭十足，捧起課本發誓：一定不可以辜負岑老師的期望。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期末考試，然後終於放榜了。我的分數引起了同學的譁

然——我是全班第六，真的只須繳交一半學費。

岑老師再次鼓勵我說：「如果你升班後再考好一些，我可以向校長推薦，減免你全部學費。」我被注入了新的動力，到了初三學期末的考試，拿了第三名。真的不用交學費！

到了高中一年級，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又來了，羅怡基校長派人將我叫去，跟我說如果我能夠再接再厲，連堂費也可以豁免。結果，我以第二名的成績，不用交一文錢而能夠坐在課堂上。



·十七歲的我。



·聖保羅附屬幼稚園畢業相。（第二排左六：我）

學校亦對其他有經濟困難的同學減免部分的學費，我們很感恩學校對我們的關懷與愛護。

在聖保羅男女中學，聽說我是唯一一個堂費學費全獲豁免的學生。

經濟方面的甜頭，也許是對窮人的孩子最有效的獎勵。當時，我所有的感激都化爲了動力，上進心和自尊心都被激發了出來，不分白天黑夜地埋頭用功，因爲我知道，機會來之不易，一旦失去便不見得再有了，能否爲家裏分憂，在此一舉。讀書是我唯一的保障，我一定要抓住機會。

中學時代還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彰顯了校方對我的關懷。到了高中三年級，我面臨何去何從。當時香港只有一所香港大學，入讀率很低，不過百分之二、三而已，我就就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分英文班和中文班，我是中文班學生，按慣例，中文班學生的升讀機會只有教育學院、崇基學院（中文大學前身）、台灣及內地的大學，有錢人家的孩子則多了一個出國留學的選擇。

在這情形下，我是準備去崇基學院的了。不



· 在香港大學與羅怡基校長（右）一起聚餐。

料羅校長鼓勵我選擇港大。當時，只有通過預科班才能考進港大，我很榮幸地連同中文班另外三位同學被收入了預科班。

期間，我仍然不用交學費及堂費，羅校長還介紹了兩位低年級的同學給我，讓我幫他們補習以賺取一點外快。當時我每周六也在香港賽馬會打工，承蒙校長體諒，每周六的最後兩堂課可以免上，以便有時間趕去馬會。

回溯中學時代，我不能想像如果沒有遇上兩位恩師，將會是甚麼樣的人生。我肯定沒有今天的成就。香港有很多大富豪，不讀書也能白手起家致富，但我不是那種人，我競爭慾望不强，做生意鐵定失敗。我自覺是一個普通的人，沒有哪方面超人一等，如果當初輟學當學徒的話，都不一定能幹得好。當然，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對於我來說，學生時代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功課不是別的，正是感恩課。

## 人生 這一課——「勤」是最大資本

按道理說，我並沒有多少資本；我記憶力一般，不能跟那些過目不忘的人相比，歷史、語文、常識等科目需要背誦，對於我的吸引力遠沒有理科大，但我強逼自己爲了考高分而死讀；我也自認爲不算聰明，不像有些人天賦異稟，不過是因爲香港教育制度重視考試，故在考試上能夠取得好成績我就能過關。我的案例足以證明在成長過程中，老師關懷鼓勵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人要懂得掌握機會，人的潛能可以創造奇蹟。

「勤能補拙」，是一句永不過時的至理真言。



· 回到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主持畢業禮。



## 中學，珍貴是半世紀的友誼！

在我後來進入社會以後，極爲懷念在中學時代和同學相處的日子，因爲同學之間的感情是純真的，不帶任何世俗功利色彩，我的同學有的來自富家，有的來自窮家，大家不分彼此，交往一律自由自在。

聖保羅男女中學是分英文班和中文班的，英文班是主流，人數比中文班多一倍，中文班（每年級只有一班）的同學自然更加團結，但與英文班的同學亦維持不錯的友誼。多年以來，我和中文班老同學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都要聚一聚，一起吃一頓



• 中學中文班同學每月一次的聚會，這次他們來理大探我。  
（右六：我）



• 二〇〇八年，聖保羅同學畢業五十周年聚會。  
（前排右七：我的太太；後排右十：我）

午飯，這習慣一直保存了下來，大家嘻嘻哈哈，聊天無所顧忌。遇到甚麼問題，最真誠幫忙出主意的，一定是老同學了。

我們的老同學午餐聚會，我太太經常取笑說：「幾十年了，你們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些故事。」而我們總是津津樂道小時候的故事，一點也不覺得無聊。譬如在跑馬地踢足球，一班同學爲省下搭車錢徒步走去，踢完球再買來魚蛋之類的小食，大家一起吃得痛快；大夥兒去獅子山、望夫石旅行，當時那些都算是郊外了；又譬如有個同學家裏出事，大家自動湊錢給他。當時許多同學都有外號，我的外號是「天矇光」，他們取笑我天未光亮便起牀讀書，後來這外號又簡化成了「天矇」。

無論我們年紀多大，成就有多不同，見面彼此沿用外號這一點是不變的，赤子之心袒露無遺。

二〇〇八年，是我們一班老同學的中學畢業五十周年，分布不同地區及國家的同學，不論是中文班還是英文班的，都於十一月份趕回香港，歡聚一堂。我很感恩自己擁有這一份和老同學們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學生時代積累下來的友誼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來到二〇一三年，大家正積極籌備在十一月份，再來一次慶祝畢業五十五周年的大聚會。然而，人生無常，一些老同學已經離開，我們難免有些感慨。

## 二、管理時間等於管理自己 大學，同學嘲弄我畢不了業！

進了香港大學，生活變得自由而多姿多彩。

住在聖約翰宿舍，有了自己的獨立房間，還有傭人打掃衛生，那日子對於我來說是相當貴族化的了。我拿到最高級別的政府助學金，一年有四千多元，一切不用再愁。政府對我們窮孩子的資助是令人感恩的，它為我們圓了大學夢。

我修讀的是理學院的物理及化學系。那時候入港大理學院需要讀兩個學科，三年內讀完雙學科的學位是普通理學士，再深造讀完一科才是特別理學士。大學裏只有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文學院及建築學院，不像現在擁有十多個學院。六十年代初，理科成績優秀的中學生一般較醉心於科學理論研究而選擇報讀理學院，而我並不以為爲了不起，入住宿舍，周圍甚麼科系的同學都有，和他們交流，令我大開眼界。逐漸地，我意識到理學院只是一個窗口而已。



· 一九六一年秋天，港大聖約翰宿舍的一次燒烤活動，當年我（右二）是康樂秘書。



·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度港大聖約翰宿舍六樓同學合照，我（前排左六）是當年的樓長。



· 一九六二至六三年度，港大理學院學生會幹事與系主任合照，我當時是學生會會長。（前排左二：數學系主任，左四：化學系主任，左六：物理系主任）



· 一九六一年夏天，港大聖約翰宿舍的一次學生會活動。（左一：我，右一：宿舍學生會會長）



· 一九六三年春天，在港大理學會一次校外活動中，作為會長的我介紹一些活動細則。



· 一九六三年，在港大理學院院長（右一）陪同下，我（中）以畢業生代表身分，跟港督（左一）見面。



· 一九六二至六三年度港大學生會幹事會與學院及宿舍學生會會長合照。（第二排左五：我）



· 一九六二年競選港大理學會會長時演講。



「應該利用大學時光拓展接觸面，多做事情。」——我定下了新的計劃。

大學二年級我開始積極參與學生事務，我當上了聖約翰宿舍學生會的康樂秘書，平時組織一些文娛及社區義務活動；同時，我亦當上了理學院屬下的學生組織理學會的副會長及康樂秘書；到了第三學年，我被選為理學院學生會會長。

在同學眼中，學生會會長並不是甚麼優差。港大為鼓勵學生參加活動，特許二年班免試，故二年級被稱為「蜜月年」，但三年級的考試就很關鍵了，它是對畢業去向的一錘定音，以往一些當會長的都因分心而成績欠佳，因此一些同學笑我是自掘墳墓。

結果呢？在理學院拿到最高一級榮譽普通理學士畢業的四個同學中，我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唯一拿到此項榮譽的修讀化學專業的學生。一年後我再以一級榮譽拿下了特別理學士。

儘管考試期間受到祖母去世的影響，導致有一科未考好，幸而整體成績還是領先。當然，首先我要感恩學生會其他幹事同學，如果不是他們替我做了很大的分擔，我一個人是分身乏術的。

## 愛情，可以大過天？

我在大學的學習成績，也要歸功於我的女朋友。

回憶起我們的相識，是因一次迎新營活動，那次活動上我遇見了入讀港大理科的小師妹李婉芬，登時驚為天人！初戀是甜蜜的，一般來說，女孩子都會纏住對方去玩，

一開始我的女朋友也笑我是「書呆子」，但後來她不僅不要求我陪她看戲逛街，反而敦促我不要浪費時間，並主動陪我一起讀書，大抵因為她知道我出身貧寒，惟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吧。這一點是我回想起來總要感恩於她的。

分配時間是學以致勝的竅門，試想一下自己的狀況，真是有些應接不暇：除了追女朋友外，我還要忙於學生會事務，而且也在替中學生補習，每周三次，花六至八個小時，每逢周六下午及一些假期的整天，我還要去馬會當小工賣「馬票」，從高中時期我便開始做這些零活以幫補家計，一直延續到大學畢業都沒中斷。餘下的時間用於讀書，確實是所剩無幾。

一般來說，一個人遇上我這種情況是不容易每方面都顧及到的，但我發現，懂得分配時間及處事專注則可解決問題。我竭力爭取讀書時間，規定自己每周讀書不少於

## 人生 這一課——追女仔妙計

說起追小師妹，我也真是搏命的！那時候她住何東宿舍，人們為經常到何東宿舍對女生死纏爛打的男生起了個外號，叫「何東傢俬」，我便是其中之一了。小師妹相當漂亮，在她身邊，我的潛在對手太多了，而我勤奮讀書也是出於一個念頭：我一個窮小子，如果不能考到出國留學及讀博士，怎麼配得上她？我惟有勤奮苦讀，讓她知道跟了我是一定有將來的。那時候每天晚飯後我至少都要給她打一次電話或到何東宿舍看她，何東宿舍只有兩部公用電話，線路總是很忙，要打通一次也得排隊等很久，我的一份心意她逐漸地領會，此後我便開始與她拍拖。



十個小時，周一到周五事忙，便爭取周末及夜晚的時間溫習，但凡在用功時有人邀請我去玩，我一概拒絕，經常在宿舍有人拍門叫我去「消夜」，或「三缺一」打牌，見我不動身，同學就說：「你想搏甚麼呢？」我只管繼續讀書。人家騷擾三兩次也就作罷，而我也因此給一些人留下了「高傲」的印象。

讀書時間比不上別人多，但我有一個殺手鐮：專心。專心地讀書，便不會輸給那些整天讀書但可能不專心的同學。

和女朋友約會後，一般人讀書難免要分神，而當我想起約會的美好感覺和對方的動人形象，我強逼自己一心一意應付功課，然後也就可以全心全意跟她拍拖了。

### 意志力源於信念

管理自己往往比管理別人難多了，因為需要意志力。

意志力來源於信念。大學時代的我有一個信念：「好好讀書，將來當個教授。」



·一九六二年聖誕節假日，師妹李婉芬與我一起參加舞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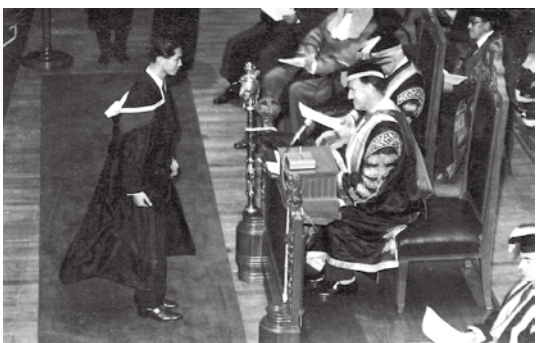
·我倆在港大何東女子宿舍參加禾稈草舞會（Barn Dance）。

「不僅要當教授，而且是當一級教授。」我暗暗說，設想着將來自己可以令太太引以為榮。

香港教育唯考試是從，學生要將大部分精力用於死記硬背，我並不是對考試滿懷興趣，但對每一次考試都必恭必敬，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就是因為心目中的憧憬能夠藉此一點點具體化。

「當教授多好，既風光，又可以滿世界跑。」經常聽別人這樣說，我心目中的教授，還代表着神聖高超的學術和知識，而倍受尊崇。

終於，我順利地告別了四年大學生活。



·一九六三年畢業照。

## 人生 這一課——時間管理

時間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而且一去不回。有一句西方諺語說：「你熱愛生命嗎？若是，就不要浪費時間，因為時間是生命之本。」時間是固定的，沒有誰比誰能夠擁有更多，每人都是每天一千四百四十分鐘，每周一百六十八小時，唯一的變數是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調配時間，而這意味着我們首先要管理好自己。

### 三、位卑未敢忘憂國

中國人，低人一等？

「位卑未敢忘憂國」，到英國留學之後，我體會到了這句老話的分量。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進入倫敦大學念博士。倫大是多個學院聯合組成的聯邦制大學，我就讀於大學學院。本來我讀博士有兩個選擇，一是去美國，二是去英國，之所以與倫大結緣，歸因香港大學化學系主任的推薦，在倫大我獲得了一份被公認最優厚的英聯邦獎學金。

初來乍到的興奮很快便冷卻下來，緣於一次酒吧聚會。

那是在我入學的第一個周末，一群學友帶我去酒吧。他們大多是本地人，周末酒吧是習俗，我便加入了他們，每人要輪流替大家買一次。一個回合下來，我喝了七杯，醉了。在酒吧的喧囂中聽他們談起了英國的事宜，顯得很以英國為榮，他們還談起了中國，「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沒有前途。」……我在耳酣酒熱中聽他們如此說，其姿態明顯表現出對我這個在場的唯一中國人不屑，我不知如何置喙。

第一次嚐到甚麼是屈辱，它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我不再雲裏霧裏，心理上有一團化解不開的沉重。

那個年代的中國，在中央政策失誤下剛經歷了三年大饑荒，在冷戰的國際格局下受西方國家經濟封鎖，與前蘇聯老大哥翻臉而被逼還債，國力大減，貧窮落後是事實，

去英國的中國人絕大多數是做低下層工作，難怪給人家如此印象。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甘地傳》，頗有感慨，印度民族英雄甘地在英國受過四年高等教育，已經成爲了律師，他赴南非接手訴訟案件，坐火車的頭等車廂，卻因爲膚色被驅逐，這個例子據我所知不算是最嚴重的。當然華僑的狀況在逐步改善中，但無論如何外國人在心底還是看不起其他膚色人種的。

在英國留學的又一個晚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又令我嚐到了作爲中國人的自豪，收音機的新聞節目播放了這一消息，在場的英國同學驚叫：「是不是弄錯了？」、「原子彈一定是蘇聯人做出來的。」他們向我表示要重新評估中國人的潛能，堂堂大英帝國僅在十幾年前才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而已。



• 一九六四年秋天，初到倫敦。



• 在英國與博士導師托比教授（左）合照。

身在倫大，畢竟是異國他鄉，寂寞是免不了的。那時候我根本打不起昂貴的長途電話，主要的寄託是向小師妹每天寫一封信傳情達意。小師妹因忙於考試，三、四天甚或一周才回一封，每次收到她的信我總是要看上幾遍才罷休，幸虧我留學第二年小師妹從港大畢業前來英國和我結婚了，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們的婚禮是在倫敦大學的天主教堂舉行，參加的朋友只有五、六位。我的心十分溫暖，在英國有了她的陪伴便有了無限樂趣，我們相親相愛，百分之百的時間都是屬於我們兩人的。

我們住在倫大宿舍，她很快便找了一份給教授當助理的工作，地點和我的化學實驗室是在同一幢大廈，因此我們經常手拉手上班。她下班比我早，總是先回家準備了晚餐等我。很多時候吃罷晚餐，我又回實驗室工作，她亦無怨言。在英國，我們親戚朋友不多，很有相依為命的感覺，總是形影不離。周六我們一起去街市買菜，沒甚麼做菜經驗的她學着當個好主婦，周日我們一起去教堂禮拜，去海德公園曬太陽，放假了就利用儲蓄去四周旅行，我們把歐洲都跑遍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和小師妹李婉芬在主禮神父面前簽署結婚證書。

一個人要受外族尊重，原來跟國力強弱與否有直接關連。難怪當時的周恩來總理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國防力量正是國家之間競爭的重要平台，我明白了這道理，便不由自主地想道：「如果將來有一天我有能力，一定要幫國家做點事情，國家好，全世界華人都得益。」

於是，我開始了在異國近乎孤獨的自我奮鬥，戰場是實驗室，武器是專業和勤奮。

說起勤奮，一件有趣的事例可以說明：一些同學背地裏給我取了一個綽號——一個「潘」，甚麼意思呢？化學中有很多以人名作為單位的名稱，他們乾脆以我的姓氏為單位作為勤奮程度的命名。

「倫大學生誰能達到『一個潘』的？只有潘宗光了。」他們說，並將其他人說成「零點幾個潘」之類，這綽號逐漸地傳開了，經常有人笑着說起我道：「看，一個潘！」

情形令我有一點尷尬，我決意不理會別人怎麼評價我或看我，只是埋頭於自己的專業。

值得慶幸的是，我終於有一些成績或表現顯示了自己的不甘平庸。有一次，我的導師托比教授（Professor Martin Tobe）在研究中遇到了瓶頸，我花了月餘時間替他解決了問題，此後他逢人便誇我，並將我帶往出差或出國開學術會議。有時候，我乾脆代他上台發言，這下子在倫大又是聲名大噪，哪個同學有我這樣的機遇周遊列國？人們都議論中國小子不能小看。我没等畢業已經發表論文了，在當時這也是倫大有幸的事。



## 「加工」給未來發展鋪墊基礎

在倫大學習了三年，拿了博士學位（PhD）後，我去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

在這裏我又要提及感恩，我的導師托比教授待我實在是十分重視，正是由於他的熱心介紹，我結識了來倫大講學的加州理工學院（簡稱「加工」）的化學系格雷教授（Professor Harry Gray），並得以追隨他赴該校從事博士後研究。格雷教授對我亦特別照顧，在加工的一年，我得以認識一些國際上著名的或重要的專家學者，為我未來的學術發展鋪墊了人際網絡基礎。

舉世聞名的加州理工學院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帕薩蒂納，它規模不大，理工科方面走在世界尖端，可謂是小而精，擁有一流的科學家，僅獲諾貝爾獎者便已達三十多位，著名的火箭專家錢學森教授也曾在那裏任教。近一個世紀之前，它曾是藝術和手工藝的學校，由一名從商的政治家創辦，因此注定了它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分支也有着相當的分量。在優美的加州理工學院獲得的經驗，無形中對於我後來管理香港理工大學有莫大的裨益。

格雷教授給予我相當於一個助理教授的報酬，令我的生活比在倫大寬裕。

有趣的是，那年剛到加工化學系，不知怎的我在



· 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導師格雷教授（右）到理大訪問時合照。

倫大的聲名已事先傳播開來，以至於我的指導教授在課堂對學生們說：「大家要用功些，『一個潘』就來啦。」惹得滿堂歡笑。

我不是一頭鑽進實驗室只做研究，也借此機會好好體會美國社會的人生百態。

在加工的校園碰上的都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面孔，大家見面都點頭問好，輕鬆隨意地聊天，令人感覺美國確實是個開放自由的國家。當然，在這裏一切都講進取、講效率、講創新、講競爭，優勝劣敗每分每秒在變化，因此還是有一種壓力潛藏的。

在加州我和太太盡情享受着美國的寫意生活，我們買了第一輛二手車，平時開着它四下遊逛。入學那一年暑假，我們免費幫一家公司將車從洛杉磯駛到美國東岸的紐約，這樣我們就不用租車而做了一次橫跨美國之旅，為時十天十夜，驅車三千多公里，經拉斯維加斯賭城、大峽谷、黃石公園、總統山等景點，再從紐約坐長途汽車經尼加拉大瀑布到加拿大多倫多，然後坐飛機回洛杉磯。在美國生活的情景，回想起來充滿了快樂與稱心如意。

## 香港仔，回來了！

按道理說，我應該在美國留下來，以我的學歷，留校或到其他大學當助理教授，甚至在社會上找個職位，皆無困難。

但我選擇了在博士後研究結束後返回香港。

做這個抉擇並非容易，若在美國留下，是有着種種的便利，但她畢竟是別人的國



·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與太太駕車橫跨美國西岸至東岸，最終到達加拿大多倫多，在尼加拉瓜瀑布前留影。

家，黃種人在那裏，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從血液中融化成爲西方人，無論你在專業上何等成功，也不一定打得進主流社會圈子。那個時期我想起了剛到英國的屈辱，英國同學對中國的輕視便是對我的輕視，我一直有個心願是爲中國盡力，只有國家好了她的國民才能享有尊嚴。

若留在美國，做研究可以擁有充足的資源和一流的設備，有利於個人在學術上的發展，這一點是很吸引的。但回到香港，儘管科研條件遠不能和美國相提並論，但我相信自己在學術上仍可以有所作爲，正所謂：「英雄造時勢」。

一九六八年聖誕前夕，我回到香港大學任教，昔日備受尊敬的師長變了同事，情形令人興奮。大家見到我也都說：「噢，你怎麼回來了？」語氣似含惋惜之意。一開始我有一點不自在，但又想到：「回歸自己的社會有甚麼不對的呢？」便慢慢習慣了自己

在港大的位置，和同事也能自如地往來。尤其是站在熟悉的課室面對一群黃皮膚黑頭髮的孩子，不由要自豪地想：

「看，我教的是自己的學生。」

我初回港大的時候，比大學生及研究生只是年長幾歲，經常參加他們的課餘活動，包括旅行等等，可謂亦師亦友，學生們一般都對我很好，亦尊敬我的學術成就，大家十分投契。有些學生連遇上個人問題，包括與女朋友吵架之類的事情，也找我商量！

我不能想像呆在異國是否有如此的親切自在，那一定不是屬於自己的人生。



· 汪明荃（後排左六）在八十年代主持的特輯《汪明荃眼中的成功人士》，當時她訪問我（後排左五）在港大的工作，並與學生合照。

## 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只靠運氣終有一天迷路吧？

在香港大學從事教育工作整整二十二年，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

在那個年代香港沒有濃厚的學術氣氛，也沒有現在的研究資助局之類的機構，研究經費及研究生名額十分有限。在港大化學系，和我情況相仿、從海外回來的同事，有前任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教授。系裏對我們很重視，從不多的經費中撥出相當部分供我們做研究。

一般人認爲，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香港肯定做不出甚麼學問來了。對此，我要特別感恩當時港大化學系的系主任佩恩教授（Professor Douglas Payne），如果不是他大力支持，對我另眼相看，我實在難以取得理想的學術成果。後來在我的升職問題上，他亦每每爲我向校方爭取與推薦。

## 人生 這一課——家鄉需要我們

作爲一個在艱苦環境長大的人，我並不介意家鄉的相對落後。正是因爲落後，故鄉才需要我們這樣的人爲她效力。我是這樣想的，美國不一定需要我們，最需要的還是自己的家鄉。何況家鄉有家人和熟悉的圈子，那份血濃於水的感情一直在我心中激盪着。所幸的是，我的選擇獲得了太太的支持與理解。

在他及其他同事的支持下，我在事業上有了不錯的進展，在港大任教不到七年便升任為高級講師，兩年後再升為教授，再過五年升任為講座教授。當時在港大每個學系只有一個講座教授的職位，另外全校有不到十個講座教授的浮動職位，當年剛巧有三個空缺，所有教授都可以競逐。我非常感恩，從講師做到講座教授，化學系就只有我一個人有這個機會。一九八三年一月起，我更擔任港大理學院院長。

我專注在無機化學方面的研究領域，包括過渡金屬大環化合物的合成、動力學及機理研究等，寫出一些文章發表在權威的國際性刊物上，這些文章是我親筆而為，一般情況下是我和學生合用署名，逐漸地我將自己的署名放在學生的署名後面，因為這樣能對學生有所扶植，在有關刊物中有些文章獲得了不記名評審專家的崇高評價，評語中甚至出現了「最有趣」、「罕有」、「希望有更多這類文章」等詞句。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獲頒倫敦大學資深理學博士學位（DSc, Doctor of Science），此資深學位跟一般的哲學博士（PhD, Doctor of Philosophy）不同，

後者是指跟一位導師做研究、寫論文、答辯，而我則要由倫大多位專家審批我的著作，並認為我的研究達到了國際權威水準，才能獲頒資深學位。港大能獲此學位的，寥寥可數。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陶畢教授於一九八五年寄給我的信函。

一九八四年，我驚喜地收到了一份來自美國史丹福大學化學系陶畢教授（Professor Henry Taube）的來信，他在信中指出我們在鈦（Ruthenium）金屬問題的研究上很有突破性，亦為他打開了思路。這位教授可不是一般教授，他是一九八三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時已認識他，他領導的史丹福化學系和我們研究的領域有所重合，互相競爭，我一直暗暗自勉不能輸給對手。在一番苦戰之下，到了下一個年度，那位諾貝爾獎得主竟然又寫來了信，宣稱他們退出競爭，將有關研究的空間拱手相讓。

這時港大化學系在鈦的大環化學研究方面，已有一定的國際聲譽。我很高興能成功栽培我的博士生支志明。現時港大無機化學組的支志明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任詠華教授，以及他們的徒弟徒孫在延續這方向做得十分成功，我亦很驕傲現時港大的無機化學在世界上極具名氣。

## 人生 這一課——科研上的知己知彼

是命運嗎？誠然做科學研究需要一些運氣，我承認自己的路途比同僚暢順，但是光講運氣是不行的，做科學研究也是對人的綜合素質的考量。例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化學領域以有機化學研究為主，無機化學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可供發展研究的空間很大，競爭對手也較少，只要發表一些有分量的論文就容易受人注目及出人頭地。我自知要在熱門領域與人競爭不易，因此選擇了無機化學做研究，從自己的實驗條件來說也是以無機化學為選題較為有利。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兵法》的名言用於我的做學問行爲也並不為過。



## 只因一次錯失就放棄？

在我擔任港大理學院院長期間，每次放榜後，必定與每位不合格同學會面，了解情況。記得有一位是重考生，按規定如他再考試不及格是沒有機會再讀的了，但我發覺他的成績其實並不太差，其中有一科很接近及格，而只要這科能過關，他便可以畢業了。

因此，我再深入了解他的情況，原來他在那科考試的前一個晚上，和宿舍的同學去參加學生運動，並熱血沸騰地跑上街去示威，因此也就沒有充足的時間溫習，雖然事後後悔不已，卻無可挽回。儘管他的行為衝動亦不智，我認為為免浪費人才及浪費社會對學生的投資，雖然已放榜，仍希望能夠重新審查他的學業成績再作決定。系主任與那科的老師同意除了審閱試卷外，亦拿他一年來的功課加以考慮，最後綜合所有因素破格評他合格，他多年來在大學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拿到了學位。

佛教有「世事變幻無常」之說，我因此覺得更不可用既定的框框看學生。固然，教育的目的是栽培有成就及成功的人，但對失落者更要扶持。當中，可因應不同的環境和情勢在框框下酌情變通，如何在制度之內取得更完美的成果？其中最需要的，是取得平衡的智慧。

再說，想當年如果没有中學班主任及校長和我的幾次面談，便可以說沒有今天的我，人生往往就是這樣——遇上一個契機便可能大為不同了。我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因此對學生亦不免盡一切機會給予幫助，這也是恩師的行為為我樹立了榜樣。

## 人生有失也有得

我的人生和事業之旅大致上是一帆風順的，但也不是沒有挫折，這要從我當上理學院院長一事說起——

一九八二年年中，已是講座教授的我面臨一個大好機遇：系主任佩恩教授退休，系裏的同事均認為我是接班的理想人選，校方卻請來了一個英國人。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重要的位置都要讓予英國人，中國人看在眼裏都很抱不平，但又無可奈何。

僅隔半年，就令我體會到了甚麼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十分地巧合，理學院院長的位置空了出來，而按規定，院長職位一定得通過老師們一人一票選舉，方能勝任。我以四十二歲的年紀成爲了理學院院長，大家都向我恭賀。

如果當了系主任，我便不會競逐院長職位了，因為我要首先辦好化學系。

## 人生 這一課——教育不為製造失敗者

看重每一個學生的考試過關情況，也許有人會覺得我婆婆媽媽，但我堅持認爲教育的理念在於栽培有成就感及能爲社會作出貢獻的年輕人，而非製造一些心灰意冷的失敗者。因此應該在成績不及格的表面現象之下，更深入了解其背後的因緣條件再作決定。雖然新決定會打破過往程序的舊框框，但只要不濫用權力，按個別事件的特定情況處理，有時候會比遵從既定的決策模式更爲可行。當然，如果這些決定有任何負面影響，我是應當負起責任的。

再往下想，如果沒有理學院院長的磨煉，我也未必能成爲後來的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因此，我要感謝我的理學院同事，正是他們的鼓勵及支持，我才得以坐上這個位置。理學院院長每三年一任，我一連三次地獲得他們的投票而當選，亦即是連任三屆理學院院長，可惜未做完第三屆，我便轉到香港理工學院當院長了。

回想起來，命運的用意往往是事先不爲人知的，過後才令人覺察它的精妙佈局，系主任一役的失利對我來說實在是極大的恩惠。儘管蒙受了一些挫敗，有一陣子我甚至爲此沮喪，之後自己的道路卻更寬了。

和系主任相比，理學院院長的空間要大得多，系主任只負責系裏事務，來來去去接觸的不過是化學界別的人士，而理學院院長有相對的獨立性，亦是校方的領導班子成員之一，要接待各方來客，包括外國教授及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接觸面和行事都上了一個層面。有一次，我帶代表團赴內地大學訪問，各位系主任成員都是外國人，接待我們的校領導，有點驚訝，在殖民地的香港大學，居然有中國人當院長，帶領一班外國人系主任來訪問交流。

也正是因爲我的接觸面，一九八五年成立的香港科技協進會才邀請我擔任第一屆副會長，而這一切似乎都是爲了被委任爲當年的立法局議員席位而鋪路。即是說，如果沒有港大理學院院長和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的履歷，那一年港督要委任一位能夠代表教育及科技界的議員，便不會選上了我。

我從自己的際遇確實感到了禍福往往是難以分辨的。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便是指一件事情至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看，毋須執着於表相。確

實，我們在生活中經常可以參見這樣的道理——危機未必不是轉機，逆境往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事變幻無常。自此，我常常告誡自己遇到挫折不必怨天尤人，遇到好事也不必過度張狂，一切都以平常心看待。《金剛經》的「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成了我的座右銘。在我的辦公室的牆壁上便貼着這四句偈語，對我時刻加以提醒。我也常在講座中作出分享。按照道家觀念，宇宙生命原本便是循環往復，得失互見。

說起我的事業走向，不能不提及的是一九七九年香港的「十大傑出青年」選舉，我榜上有名。香港十大傑青選舉的宗旨是，表彰在工作上有卓越表現並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本地青年，鼓勵青年銳意進取。它由香港青年商會於一九七〇年創辦，之後停辦了幾年，我是第七屆入選者。恰巧我除了學術上的成就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曾爲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做一點測試產品的工作，算是符合了條件。和我一起被選上的還有四人，包括醫生、小童群益會總幹事、設計師及中學老師，當中有一些知名人士，而當年我還只是一個無名之輩，卻突然躋身公眾人物之列。

那一年對於我是雙喜臨門，因爲我又剛巧獲得倫敦大學資深理學博士學位，可謂在專業上一旦獲得國際認可，各項榮譽和機會便如雪球般滾過來。

當年最高興的是我的媽媽，她不斷收到親戚朋友的祝賀。我不能忘記是她當年在困苦的歲月中，排除萬難，堅持讓我繼續求學。我對媽媽實在充滿感恩。她希望我能成才的心願總算達到了。

我哥哥叫宗耀，媽媽爲我們兄弟取名字中有「光」有「耀」，正是希望我們光宗



·一九七九年，我（右三）  
獲選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耀祖，當然光宗耀祖不見得只在於名和利，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品格上。

媽媽經常教我們要「知恩圖報」、「光明正大」等，正是希望我們做人能真正對得起祖先。

當然要感恩的，還有撫養我成人的祖母。最令人難過的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前她已經過世，我的媽媽亦是在我當上香港理工學院院長之前離世，「子欲養而親不在」，惟有一番遺憾留在心頭。

## 人生 這一課——最窩心的教誨

算起來祖母去世迄今剛剛五十年，我時常會懷念她，遺憾的是她看不到我大學畢業就離開，而那該是她非常期待的一刻。我年少時，她經常撫摸着我的手和臉，將一些好吃的食物留給我，慈祥地教我做人——要容忍，要爭氣，要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心……言猶在耳。在我讀大學時她半身不遂了，要坐在輪椅上度日，我很悔恨自己没有經常回去看望她、陪伴她，這成了終生的遺憾。

### 最珍貴的禮物

我的媽媽爲了供養我們讀書而勞苦一生，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浮現她編織毛衣的情景——媽媽白天工作，晚上及周末還要從工廠取毛衣回家編織，以幫補家用，小少年紀的我在眼裏，十分心痛。

如今，我身邊還留存着當年留學英國時母親親手爲我編織的兩件毛衣，一件啡色，一件淺藍，我不捨得穿，視之爲自己平生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 我的祖母。



· 一九八五年拍下的家庭照，其時三代同堂，媽媽（右五）笑逐顏開。

### 潘校長的感恩第一課

成長過程中，很多人因為我的出身特別加以幫忙；寄居生活也養成了包容、能讓且讓的性格，令我在社會上做人做事也比較順利；中學老師和校長給我的獎勵，令我學會爭取及把握機會。

任何成功，首先要自己努力付出，再配合好的「助緣」（環境條件）；要是成功了，不必過度張狂，當感恩成就助緣的人和事；要是暫未成功甚或失敗，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氣餒，須自我檢討，更好地裝備自己，多結善緣。如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我學會一切都以平常心看待。



第二章

從政篇

## 一、從政有助拓寬視野

### 走進大千世界

一九八五年秋季的一天，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找我，說港督正在物色一位學術界人士入立法局，「如果推薦你，有興趣嗎？」

我意識到人生的重大轉機到來了，一口答應。

李鵬飛是我入選十大傑青時結識的朋友，他比我早兩屆入選。當年港府只有三個新委任議席，而李鵬飛負責推薦兩人，他推薦的其中一位是代表青年社工界的王芻鳴，另一位須代表科技教育界。由於我有港大理學院院長和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的背景條件，遂獲得推薦。

進入從政的領域，視野比做大學教授開闊得多，不再是閉門造車，而是實實在在地與大千世界發生關係。打個比方說，八十年代中後期發生的大亞灣核電廠事件，便令我對於政治及社會方面有了切身的了解。

一九八六年，中國政府要在深圳大亞灣建立核電站，恰巧前蘇聯同期有一個核電廠爆炸，導致核輻射洩漏，引起香港人集體恐慌，市民擔心大亞灣核電站倘若發生同樣情形，其輻射將對香港造成嚴重損害，並成立了反對組織。大亞灣核電站成爲了一個揮之不去的恐懼情意結，有人更借機煽動民意，將事件政治化，有了反對中央政府之趨向。

立法局成立了專責小組，深入分析，要搞清楚大亞灣核電站的類型、結構、安全指數等等。我先後跟兩個小組去了歐洲及日本，大開眼界。我發現，在實踐中對核電站的認識，和在學院死啃科學理論是不同的。

根據綜合分析，我們認識到將興建的大亞灣核電站跟發生意外的前蘇聯核電站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它有三重保護要素，就算爆炸也不一定會引起核幅散。

對於大亞灣核電站的建立，我表態支持，並在不同的場合，從科學角度向大家解釋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指數，同時我們要求中方加強運作過程的透明度，以及在管理上達到一定的水準。

但如此一來，我成了眾矢之的，「親中」、「左仔」，指摘聲紛紜四起。



· 一九八六年，由譚惠珠（左四）領隊到法國考察核電站設施。（左三：我）



· 大亞灣核電站安全諮詢委員會成立典禮。（右六：我）

## 立法局，為誰而工作？

立法局給我的教育是多方位的，人生百態，每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每一個領域和另一個領域，表面上看來沒有相干，其實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科技與民生之間，我作為立法局議員不能只執一端，而是要全盤考慮。

又譬如處理豬農排放廢料污染事例，政府立例監管，要做很多前期工作，於是我們深入了解有關豬農和飼料供應商及有關行業的影響，接見市民及專業社團人士，了解整個領域的情況。

我從中切實感受到甚麼是民生。

相信這些細節不是一個大學教授能想得到的，更何況在過程中還要照顧中英關係的敏感狀況等等，即使一個大學的學院院長，也未必懂得面對。

值得慶幸的是，那時候香港立法局的運作沒有現在這麼政治化，很多會議最終亦能作出較合情合理的決定。

## 政治是甚麼？

經過大亞灣一役，我開始知道甚麼是政治。

它可以和科學精神大相逕庭，不一定說一便是一，也不一定講實事求是，在必要

的情況下，真相可以歪曲，有些政客可以向民衆說假話，對政府及一切敵對議員諸多挑剔，一切以選票為重，以爭取曝光率為重，而民意是易受誘導及難以測度的。

在立法局做人像我這樣不懂政治，便可能隨時踩上地雷。

## 政治 這一課——貴乎上善若水之心

當年美國總統布殊再當選連任，令我對政治產生很大的懷疑及擔心：美國是捍衛民主的強國，但選民的眼睛是否真的雪亮呢？有些政客可以採取一切手段隱瞞事實，玩弄選民，所帶來的禍害是有目共睹的。《道德經》講「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我希望我們的議員能夠真正做到具有水的特質，肯處衆人之所惡，善利萬物而不爭。



## 一一、不能只看表面現象

### 我們不是中國人麼？

那年代，香港的政治空氣是有着猜忌的，隨回歸日程表擺上檯面，一些人懷疑中國政府搞「一國兩制」是騙人藉口，立法局分成兩派，一派是以李柱銘、司徒華等民主人士為主，另一派是以譚耀宗為主，表明支持中央，壁壘分明。

我是一個學者，並不刻意爭取與中央政府建立關係，也毋須嘩眾取寵爭取曝光率，不過是為人處事保守一些，兼且我的另一個身分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於是我被歸為「親中」派。

我承認自己不是一個激進派或民主派。

我反思自己是一個有強烈愛國心的人，在「一國兩制」下，我們要「親中」及「親香港」，難道身為中國人要「親英」、「親西方」嗎？

這一點毋須多說，在英倫求學時期被外族歧視，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已在心底種下。雖受西方



· 一九八七年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合照。（後排左五：我，左七：太太）

教育，但我也時常翻讀中國歷史及研究中國文化。我認為無論你拿英國護照也好，不認同中國政府也好，中國都是你的國家，你不能否認自己是傳承中國人的血統；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有些人可能拿英國護照，卻沒有誰能說自己是真正的英國人。

確實，過去共產黨統治中國出了很多問題，很多人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但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雖有改朝換代，世世代代存續下去的都是中華民族。因此，我們不應該混淆政府和民族及國家的概念，看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有些人喜歡藉回鄉掃墓尋根，我從來不做這類事情，我的民族認同感在於中國幾千年文化與價值觀對我的影響，或許它是從基因傳下來的，也許我前世與佛道有緣，我的性情中有傳統中庸的及喜近佛道的成分，注定了我對政治不熱衷，我不喜歡走極端。

### 民主路有捷徑嗎？

有人認為，我反對民主；事實上，我只是認為，推行民主的步伐之快慢，以及推行甚麼樣的民主，沒有一條金科玉律。

在不適當的環境及條件下推行民主，將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西方國家害怕中國強大，以民主遏制中國發展。實際上，西方的民主有循序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中國搞民主也要視乎實情，視乎經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及人素質。一般來說，群眾總是易為眼前利益所趨動，而領導者看到的是有利於國家或地區的長遠發展，愈是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領導者愈是如此，惟目光長遠才能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而長遠策略總是要付出代價，令群眾難以接受。

在立法局的歲月，令我對國家和政治等等有了全盤的思考。

中國在高速發展中，出現了不公平現象，譬如貪污受賄等。一些人以為，政治上進行民主改革就萬事大吉了，問題是否如此簡單呢？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接掌政權，它經過了百年內憂外患，一窮二白，受到全世界的壓制，要治理好它談何容易？

我總是向一些動輒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指出：應該放下大香港心態，多了解對方。

記得年前，我到內地，當時中國還處於改革開放的早期，到處都在興建樓房而罔顧質素，很多樓房建了沒幾年就殘破了，維修保養工作又沒跟上。對於這一狀況，很多人猛烈批評。待和當地官員們坐下面談，我才知道，人家並不是不懂得保養樓房的重要性，而是先要解決當地太多人沒屋住的問題。

比方說，同一筆錢有兩個選擇：一、建十幢樓，二、建九幢樓，而將建一幢樓的錢用於維修保養。如果選擇第二個方案，則仍然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能入住新居，權衡之下，當局只能作出顧全大局的取捨。這個經歷令我又一次醒悟，凡事都要站在對方立場想一想，分析其原因，而不能光看表面現象。

再說，香港早期不也是和內地類似嗎？大片徙置區連廚房及廁所都欠缺，英國議員到訪時，還對這種不人道的居住環境大肆批評。後來香港經濟騰飛了，大家便習慣了只拿當下的標準看祖國還在發展階段的落後情況。

### 三、沒有政治烏托邦

兩頭不討好，我不受歡迎？

我不是一個對政治有野心的人。

我在立法局的定位，是專注於科技及相關的工業發展、環保及教育幾方面，這一點與別的委任議員有區別。

由於立場中立，在立法局無休止的爭拗中，我總是置於兩頭不討好的局面。

在接受委任之前，我的想法是單純的，無非是希望在香港教育及科研發展方面貢

## 政治 這一課——傳媒的責任

很多朋友認為，在很多情形下，新聞自由是被一些媒體濫用了，傳媒過分強調市場競爭，大肆報道負面甚或花邊新聞，往往執着於小小的資料，而大做負面文章，受害者就無從自辯。正面的消息及一些成功的案例或對年輕人正面影響的故事，則很少見於傳媒。例如香港人以前不懂燒炭自殺，後來人人都知道，甚至乎照此方式去尋死，正是傳媒在這方面強化報道，起了助長的作用。

很多傳媒充斥了黃賭毒之類的内容，潛移默化地毒害了人的心靈，導致世風日下。而有些政客明白到若要成功，除了巧舌如簧，更要擅於利用傳媒，政治行爲與某種傳媒邏輯的配合，令當今的政治幾乎成爲了「傳媒政治」。

獻一分力量，所以當上立法局議員的第一件事，便是提案成立科技委員會，研究如何善用科技支援工業發展，改善民生及提供相關方案供執政者參考，獲得政府正面的答覆，因此我當上了創會主席。一九八九年科技委員會解散，因與後期成立的工業發展委員會功能重疊。

我在立法局提出的議案，最多關乎的也是自己的老本行：教育及科技。

香港工業及經濟想要獲得長足發展，便不能只是停留在傳統或勞工密集的模式，要以科技為本。香港不像西方國家擁有龐大私人企業支持科研，因此這一角色應該由政府擔當，可惜政府從七十年代以來推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試看一些在科研上受到政府大力支持周邊國家及地區，如韓國、台灣等等，都有自己在國際上的高科技亮點，香港顯然是落伍了。在立法局時期我最猛烈抨擊的正是這個政策，我提出應該成立研究資助局，由政府撥款支持研究。

科技的投資需要很長時期才能產生成果，而且未必獲得直接的回報，港英政府推卸了它應該負上的責任。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香港才成立研究資助局，到二〇〇〇年才有創新科技署的成立，而相對其他國家地區而言，它們也只是小規模運作。

**退下來，我沒有失去！**

政治永遠不是烏托邦，自有它一套遊戲規則。

在政治圈中經歷愈多，不免有「無常」之感，也看得自己愈發透徹。我的發展空

間不是在政治層面上，因為起碼我有三個政治基因缺陷：心軟、單純、無政治野心。

這個社會遠不如理想中單純美好，也許我在九十年代初走向佛教，其因子在立法局時代已經種下，佛家講境由心造，煩惱亦由心生，也就是說煩惱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花一些時間想一想這些問題，就看開了，變得不那



· 一九八六年，我與太太跟港督尤德爵士見面交談。

## 政治 這一課——世事紛紜，皆因名利

從政令我十分清楚地體會了現實，大千世界紛紜人事，到底也是圍繞着「名利」二字。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政壇是私心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場地了。一些言必稱民主的政客，在私下談話中，有時候他們又是另一套，令你不知究竟哪一套說話才是可信的。有些議員不願意多花時間參與討論，但作為小組成員，他們可以拿到會議記錄，為了爭取曝光率，很多時候他們會搶先向記者發放敏感資料。又有些人高調和中央政府拉關係，可能是想要爭取未來的政治本錢。



麼緊張，緊張也沒有用，佛家說世界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都跟隨着「成住壞空」這一自然規律，亦即是「成立，持續，變壞，毀滅」，然後又轉變為另一個世界的「成住壞空」，這樣循環不息。當今正處於末法時代，眾生罪孽深重，邪正不分，充滿貪嗔癡，這是一股往下墜落的洪流，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

我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是離開這股洪流遠一些，並儘量地為社會做事，做得多少是多少，幫得多少人是多少人。後來當上了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正是相對地實現了我的人生價值觀。

## 四、從「社會大學」畢業了

### 入學體驗

立法局工作只是我的兼職，我仍然肩負港大理學院院長及化學系教授的教研工作。在大學和立法局兩邊走，愈發體會我是屬於大學的。

科學研究是我的專長，要回歸這一領域又如何呢？我想，除非能夠做出足以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成果，造福人類，否則不過是閉門造車，教授學者不問世事，在學術領域努力耕耘；充其量是多教幾個學生，多發表幾篇文章，所謂的成就只是在於狹窄的領域上。再說，在當時的香港由於經費設備有限，要在科研上闖出突破性的名堂殊不容易。



· 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我提名化學界有成就的人士角逐獎項的信函。

儘管在一九八五年及二〇〇一年，我先後兩次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讓我提名化學界有成就的人士角逐該獎，在外界看來我的學術地位又一次獲得肯定了，但我對此並不以為然。

新的機會終於來臨了。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香港社會面臨重大考驗，很多人由於對共產黨心有疑懼，紛紛移民了。港督衛奕信不願看到香港人才流失，大力增加大學名額，將讀大學的百分之九比例增加到百分之十八，並拓展一些院校，因此當時的理工學院，很有機會發展成爲一所正規大學。

一九九〇年，香港理工學院郭禮敦院長退休，理工學院校董會主席張鑑泉議員便成立了院長遴選委員會並兼任主席，負責聘請下一任院長，我在立法局的朋友李鵬飛議員與李國寶議員視我爲最合適的人選，向他大力推薦。

我當即開始角逐香港理工學院校長職位。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爲一間學院要升格大學，當上院長可發展的空間必定很大，而作爲一所高等院校的管理者，領域肯定比普通教授學者乃至大學的學院校長寬廣，在社會上的影響較大，自己能夠實實在在地主宰一些事情，實現理想藍圖。

立法局生涯對於做大學校長是很好的鋪墊，起碼遇到一些敏感的政治性問題時懂得應付，不會無所適從。

至關重要的是，當大學校長所需的社會人際網絡，我一應俱全，我有兩個人際圈子：一、工商專業界，二、政府高官，主要在立法局工作中建立的，我幾乎與所有政府高官都熟絡。

亦正是在立法局建立的人際關係，令我在一九八六年當上香港科技協進會會長那一年，能夠得到李嘉誠博士、何添博士、鄭裕彤博士及何鴻燊博士四大商業巨頭的支持，他們每人捐出了五十萬（當年的五十萬不是一筆小數目），令我們可以買下一個會址。更難得的是，他們都出席了科技協進會新會址於一九八七年的開幕典禮，這四個人物一同亮相，委實引起一番轟動效應，傳媒都說我的面子不小。



一九八七年，香港科技協進會新會址成立典禮，邀得鄭裕彤博士（左一）、何添博士（左二）、李嘉誠博士（右二）、何鴻燊博士（右一）出席。



• 二〇〇二年，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章（GBS）勳銜。



• 一九九一年，獲頒英國官佐勳章（OBE）勳銜。



• 二〇〇二年金紫荊星章（GBS）頒授儀式後，我與太太及大女兒永潔在禮賓府花園合照。

一九九〇年下旬，最後入圍競爭香港理工院長職位的有四人，分別是兩位本地人和兩位外國人，其中一位外國對手更是英國名校出身，但我並不緊張，一個有利的情況是——香港回歸在即，本地院校正要脫離殖民地色彩，改變了首要職位一律由外國人擔任的舊習。當時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是吳家煒、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是高錕、香港大學校長是王賡武，他們都是有海外背景的中國人。

也可以說，如果不是香港回歸中國，我根本沒有機會在理大施展抱負。

最後一輪角逐程序是每一位候選人與學院不同人士接觸，包括學生會及教職員協會等代表，我輕而易舉地擊敗另一位香港人對手，候選人在理工學院校董會演講，我的演講獲得高度好評。

我猜測自己令師生信服的原因之一，是已經擁有的學術聲譽，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在當時的理工學院，我的學術地位尚無人能及。事實上，在我之後任職香港理工學院（現為香港理工大學）的十八年中，儘管我沒有再參與科研及發表論文，但憑我在港大時期發表論文的質與量及被引用次數，以現在流行的指標計算，在二〇〇八年退休時，亦達到了H，指數30及論文被引用的平均次數32，在理大，能拿到這個指標或以上的教授也只幾人。



## 畢業有感

一九九一年一月，我正式赴任香港理工學院院長，恰巧當年九月，我的兩任立法局議席屆滿，當然我不會再接受委任了。因為我決意全心投入繁重的學院事務。

我在立法局並不是總不適應的，有一點令我很滿意的是，由於我是一位中立人士，不屬於任何一派，這樣便避免了成爲任何一派的攻擊對象，所以我也感恩傳媒及其他議員對我的寬容。

在立法局的工作，總的來看，我還是得到了港英政府的肯定——在一九八九年獲委任爲非官守太平紳士（J.P.）；一九九一年獲頒英國官佐勳章（OBE）勳銜。

而在回歸後，我在二〇〇二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GBS）勳銜。

在立法局議員委任屆滿的那一天，我告訴自己，我已經從香港立法局這所「社會大學」畢業了。

## 政治 這課——風波中的感恩課

有一秘密我在後來才知道，那是當時任教育局局長的楊啓彥告訴我的——原來在我被委任香港理工學院院長一事上，鬧過一點風波：事緣於當時的布政司（相當於現在的政務司司長）霍德以我的「親中」傾向爲由，試圖阻止這一委任，但經校董會主席張鑑泉的堅持及楊啓彥的勸阻，我才順利當選。我很感恩他們，可惜兩人都已經過世。

說到這裏，我忽爾回想起大學時代，楊啓彥是港大與我不同學系的同學，當年經他推薦，我還曾經爲他女朋友（即現在的楊太）的弟弟當過補習老師。

我亦感恩當時李鵬飛議員和李國寶議員的推薦，他們在我的人生轉折點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我亦很感恩香港立法局爲我帶來了寶貴的人生經驗，從政經歷令我更清醒地了解自己，也更了解人生百態，我因此而知道接下來要走怎樣的路，才最爲符合我的志趣。

## 潘校長感恩第二課

雖然我自知不適合從政，但兩屆立法會議員的經驗令我體會了現實，大千世界紛紜人事，到底也是圍繞着「名利」二字。同時也讓我更認識、了解自己，清楚自己的價值觀，知道自己的位置，最終選擇離這股洪流遠一些，並用心地發揮所長，在大學踏實做事。

雖然我並不屬於政治，但這又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塊，因為當年與工商專業界及政府官員建立了良好的網絡，為理大日後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每個人的一生都由無數個階段組成，每一個階段都要擔當不同的角色。珍惜眼前，感恩每一個機會，盡力做好每一個角色，並且按部就班。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然後努力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不用急進，也別被途中的誘惑影響你向着目標進發。